

# 国际关系学中的经典与阐释

——评《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

陈玉聃

**内容提要**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学术界,有关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关注并不多见。《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一书的出版促使我们思考,两千年前的东方经典何以能为我们提供裨益,以理解架构在西方近代传统之上的当代国际关系?本文认为,经典著作之所以能够产生恒久的影响,主要在于时间上的穿透性和空间上的相似性。春秋战国时期的经典提出了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而所处的国家间关系形态与当今国际社会又有相似之处,因此能为当代理论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当然,作者也指出,经典思想与当代理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解读和阐释经典时需要加以鉴别,避免误读和比附。

**关键词** 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 经典 阐释

国际关系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不过百年历史,而在这一个世纪中,西方学术界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不论在研究者还是外行人看来,国际关系学说也许总

《国际政治科学》2008/3(总第15期),第102—114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有着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曰“新”,一曰“洋”。因此,《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下文简称《选读》)一书,单就标题而论,便是具有震撼性的。它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两千年前的东方经典,何以能为我们提供裨益,以理解架构在西方近代传统之上的当代国际关系?

古典著作要为今所用,大抵需要两个相关的前提,一是时间上的穿透性,二是空间上的相似性。前者意味着,这些典籍所提供的思想——至少是其提出的问题,应当是根本性的,不囿于某个特定的时代,而贯穿于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之中。后者意味着,这些典籍所产生的社会背景,应当与今日的社会有所相似,至少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中,具有相近的框架。《选读》的编者以先秦而非其他历史时期的思想为主题,无疑也带有这方面的考虑。巧合的是,不论东方或西方,同一时期的思想和历史,似乎都是当代国际关系研究可以挖掘的素材。在思想上,这一阶段被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称为“轴心时代”,东西方的哲人提出了关乎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并形成了延绵至今的文化传统,使得此后的人们始终无法回避这一起点:“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而在空间上,春秋战国时期与希腊城邦时代,在“国”与“邦”之上都缺乏事实上的最高权威,与当代主权国家体系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由于国际关系理论及其研究方法长期以西方为主导,因此我们不妨先简要回顾一下西方学者的研究。

常为人所忽视的是,早期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与古希腊经典著作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历史上第一位国际关系教席的执掌人。齐默恩(A. E. Zimmern)便是著名的古典学家,曾担任过牛津大学的古代史讲师。笔者所见的最早一部国际关系思想史著作也出自于英国古典学者之手,并以古希腊为其

---

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显然,不仅国际关系理论与近代西方的思想传统密切相关,以主权国家体系为基本架构的国际关系现实也来源于近代西方的历史传统。

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第3页。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年版,第14页。

同期的印度也符合这两个特征,但作者对此未有研究,本文不拟做出论述。

通常认为,1919年威尔士大学阿伯里斯特威斯分校设立的威尔逊国际政治教授一职是最早的国际关系教职。

开端。现实主义的奠基人摩根索 (Hans J. Morgenthau) 是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大家, 在《国家间政治》中还引用了修昔底德等人的词句。然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国际关系学科愈来愈成为“科学”的学问。尽管仍有吉尔平 (Robert Gilpin)、奈 (Joseph S. Nye, Jr) 等理论家对古希腊思想做出了某些研究, 但在古典学的造诣上已无法与前辈相比。

在西方学界, 虽然学者们多能意识到经典的价值, 如“任何一个国际关系研究者都能从修昔底德的历史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获得启发”, 但对经典的阅读多是零散的、浅薄的。这不仅仅是因为, 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是当代国际社会, 还因为新兴的国际关系学科相对于哲学、政治学等传统学科来说, 既没有自己的经典, 也没有读经的传统。怀特 (Martin Wight) 在 1960 年发表的《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即为什么没有“关于国家间关系的思维传统”) 中写道, 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无法像政治专业的学生那样, 被指导阅读本学科大师 (如亚里士多德) 的经典著作。这也仍然是当今学术界的现实。

而对西方轴心时代思想做出过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们, 彼此之间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他们对待经典的态度大致有如下三类。其一, 借古立今, 在强调古代思想和现代理论共性的基础上确立某种学术传统。例如, 吉尔平将现实主义传统远推至修昔底德, 并称他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第一个科学研究者”。其二, 抑古扬今, 在承认古代思想和现代理论差异的基础上强调前者的局限性。例如, 齐默恩认为, 不应当“过于僵硬地将希腊的思想和准则应用在现代社会中”, “修昔底德和柏拉图不能使我们获益”。其三, 以古促今, 在强调古代思想和现代理论差异的基础上, 试图通过前人的智慧修正和启发当今的学说。例如, 约翰逊 (Laurie M. Johnson Bagby) 认为, 修昔底德从根本上否定了当代国际

---

F. Melian Stawell,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ondon: Thomson Butterworth, Ltd, 1930).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9 页。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1, 1960, p. 35.

罗伯特·G 吉尔平:《政治现实主义的丰富传统》, 载于罗伯特·O. 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277—281 页。

A. E. Zimmern, “Political Thought,” in R. W. Livingstone, ed., *The Legacy of Gree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pp. 325—327.

关系理论的构建方式,他告诉我们,应当“否认任何决定论,不论这种决定性来自于人类激情或是国际体系”,没有一种单一的理论能够解释世界。

反观中国学术界,实际上在民国时期已有国际法学者对先秦国际思想做出了某些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徐传保在巴黎大学完成并出版的博士论文《国际公法与古代中国》,其上卷“曰‘思想’(Les Idées),先秦诸哲关于国际关系之名学说属之”。但总体来看,时至今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在理论研究中,对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的关注仍是极少的。因此《选读》一书若能如编者所言,“引起国际关系学界同仁研究我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的兴趣”,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回到本文开始处的问题:东方经典何以能有助于理解当代国际关系?显然,经典与今日的学说,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历史背景上都既有“同”又有“异”,笔者便试图从异同两个方面,浅谈对《选读》的学习体会。

### 一、古今之同:相接的平台

《说文》:同,合会也。先秦思想与当代理论的“同”,与其说是观念上的完全一致,不如说是思维上的应和相交,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具有通约的平台。这种“同”体现在何处?我们又当如何认识和对待这种“同”?

我们当然可以从典籍中摘出不少的词句,发现它们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共同点,但这样的做法不仅是生硬的,也有着断章取义的危险。从宏观或者根本的角度而言,笔者认为,两者之间的“同”,体现在前述的经典著作为今所用的两个前提中:其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经典提出了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包括

---

Laurie M. Johnson Bagby, *Thucydides, Hobb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sm*, pp. 220, 228;  
Laurie M. Johnson Bagby, “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ucydides as a Model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Lowell S. Gustafson, ed., *Thucydide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Last Possession*, p. 40.

如徐传保:《先秦国际法之遗迹》,上海,中国科技公司 1931年版;洪钧培:《春秋国际公法》,上海,中华书局 1931年版。

Siu Tchoan Pao, *Le Droit des Gens et la Chine Antique*, Vol I Part I, *Les Idées* (Paris: Librairie de Jurisprudence Ancienne et Moderne, 1926). 该书笔者尚未得,引文来自徐传保:《先秦国际法之遗迹》,第 69页。亦可参见 Boyd Carpenter, “Book Review: *Le Droit des Gens et la Chine Antiqu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1, No 2, 1927, pp. 405—407.

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第 6页。

国际关系领域)的根本问题;其二,它们所处的国家间关系形态与当今国际社会有所相似。

中国古代没有明确的学科划分。《选读》意识到,“先秦人士有关国家间政治的论述常常是与他们对国内政治的论述混在一起的”,实际上,国家间政治、国内政治以至于个人修养行为,在先秦思想家这里都是密不可分、甚至是一以贯之的,如《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便不能以国内政治而单论治国,国际政治而单论平天下。而国际关系在当代作为一个学科的独立,也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作为一个领域的孤立,它有着自己的范畴、方法、理论,但它的根本问题却与整个人类社会的问题无法脱离。正如多伊奇所言:“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

那么,古代思想和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所共同涉及的“关于人类生存”的问题是什么?我想,大抵有相互关联的三点:一是人的本质;二是冲突原因;三是社会规范。

例如,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遵照人的本性行事,就会带来各种冲突,“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而要平息冲突,使社会臻至有序,就必须施以教化,“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荀子·性恶》)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对国家间关系有了具体而微的阐发,“故用国者,义立而王……国无礼则不正。”(《荀子·王霸》)

实际上,在现代学术界,有洞察力的学者也往往从更深刻的人际关系来推论国际关系。摩根索等早期学者的人性现实主义自不待言,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将其学说建构在“经济人”的假说之上,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建构主义则以社会学的理论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具体观点可能与现代理论有所不同,但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而他们的解答也规定了我们思考的方

---

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第3页。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转引自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向。汤普森 (Kenneth W. Thompson) 在《国际思想之父》一书中有着精到的论述:“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无论政治的语言和景观改变了多少,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本质没有改变。……古代希腊人、印度的政治哲学家以及《旧约全书》中的先知们,他们面对的很多问题都是一样的,他们寻求理解政治,理解一个有正义和有序的政治社会存在的先决条件。”当然,这也包括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

除了人类本质问题上的相通,先秦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个“同”,在于它们都面临着相似的国际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和国际社会形态与当代的主权国家体系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一方面,随着周王朝中央权力的逐渐衰弱,诸侯国之上缺少最高权威的制约,另一方面,“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诸侯国以其内部认同和武装力量为重要特征,因此在内外两个方面,古今的“国家”都具有相同之处,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所思考的相关问题必然会令今人感到熟悉。尤其是在周朝灭亡之后的战国末期,韩非子等人以实力为导向的思想与当代的理论更具有相近的特征。

如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与今日国际关系理论的“同”,在于人类社会根本问题上的相通,以及国际社会形态上的相似。可以说,后一点包含于前一点之内,是其在一定领域内的特定体现——无论是前现代的国家还是现代民族国家,都是人类群体的一种组织形式,反映着人类社会的整体问题。

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来看,后一个“同”似乎比前一个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当代理论的学科范围内直接汲取古代思想家的养料。但笔者认为,如果国际关系学者真正想从先秦思想家这里获得启示,更为注重的应当是前者。

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间关系,其形态虽然与主权国家体系有相同之处,但其差异更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当代人身处于现代国家之中,因此若我们强调两

---

肯尼思·W. 汤普森:《国际思想之父》(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4页。

从这个角度而言,本书以“先秦”为名似有所不妥,先秦时期的夏、商以及西周都有着事实上的天下共主,只有在东周(春秋战国)才形成类似近代主权国家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而《选读》也是从春秋的管仲为始,因此若以“春秋战国”为名可能更准确。

关于两者的共同之处,参见徐传保:《先秦国际法之遗迹》,绪论;叶自成:《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朝和诸侯国的性质》,《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关于前现代国际体系的总体论述,参见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刘德斌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11章。

种国家体系的共性,就难免穿戴上“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倾向于以主权国家体系的框架和假设倒推先秦时代,从而对这一时期的国家间政治思想产生误读甚至比附。相比之下,这一时期所提出的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历久不变的,先秦思想家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则规定了以后的思维传统,而当代人则总是寄居于一定的传统之中,这就是“轴心时代”之所以得名的原因。因此,对前一个“同”的强调,即关注先秦思想家对人类根本问题的提出和解答,一方面能够更真切地理解包含于其中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另一方面也能够帮助国际关系学者更深刻地洞察当代人类社会,从而更透彻地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选读》不仅能使当代学者了解古代思想家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论述,其价值更在于,它可以成为一个起点,使人们由此切入,完整地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成为有修养、有深度的国际关系学者。

## 二、古今之异:启发的关键

《说文》:异,分也。《释名》:异者,异于常也。先秦思想与当代理论之间,当然存在着区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往往已习惯于将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分析框架视为恒常,相对而言,古代思想中的“异”,便可以看作是对这些“常识”的挑战。这种“异”,既体现在本体论层面,也体现在认识论层面。

在本体论层面,先秦思想与当代理论对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有着不同的观念。建立在西方近代政治学之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国家作为人类组织的最高形式和本学科研究的基本单位,“国际理论在学理上并不高于国家理论,它没有任何高于国家的理想和价值观,相反,它只是国家理论所附属的‘对外的’策略研究,使国家政治理论的一个特殊附庸”。相反,先秦时期在绝大部分时间内,至少有着形式上的天下共主,先秦思想家的学说大多不以邦国为基本单位,而是以“天下”为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即不以国家观天下,而“以天下观天下”(《道德经·五十四章》)。同家、国一样,天下曾经是,并且也应当是有等级、有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中文版序言。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7页。

秩序的结构。一言以蔽之,从当代理论来说,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现实常态和基本假设,是理论的解释基点和应用前提;从先秦思想而言,国家之间的这种状态是礼崩乐坏的病态,是人们所要超越的暂时现象。

例如,关于国家的对外策略,管仲主“布德”,老子主“无为”,墨子主“兼爱”,孟子主“施仁”,荀子主“礼义”,韩非子主“行法术于内”,各不相同。然而他们的着眼点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自身的权力或安全,而更是天下之得失。“布德”,为“用天下之权……为天下正”(《管子·霸言》);“无为”,为“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道德经·二十九章》);“兼爱”,为“天下治”(《墨子·兼爱上》);“施仁”,为“安天下之民”(《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梁惠王下》);“礼义”,为“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荀子·王制》);“行法术于内”,为“苟慎其道,天下可有”(《韩非子·五蠹》、《韩非子·初见秦》)。一个重要的佐证是,先秦思想家在考虑国家间关系时,往往不以本国的利益为着眼点。孔孟周游列国,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孟子·尽心上》),荀子生于赵而游齐、仕楚、入秦,吴起生于卫而仕鲁、魏、楚,张仪生于魏而仕秦,等等。他们更在意的,是符合自己要求的国家能得天下、治天下。

这种天下观的背后,是先秦时期独特的社会结构。周代册封诸侯,多为同姓之国,即使对异姓诸侯,也常通过姻亲的方式结成“甥舅之国”。因此天下之间,尤其是华族之中,国与国的关系便如兄弟,彼此构成了一个血缘共同体,而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则是家族中的家长。国际秩序就意味着诸侯国之间的长幼有序,而非基于现代的平等、自由等原则。春秋战国时期,原先的秩序遭到破坏,诸侯热衷于相互征伐,对于大多数思想家来说,重建国际秩序也就是重建彼此之间的长幼尊卑,即礼法规范,不论尊长地位是通过仁义、计谋或是力量获得。

了解这种本体论上的“异”,对我们理解先秦国家间思想是重要的。如《选读》在《左传·成公三年》的导读中,认为臧宣叔的等级规范观念“可以解释现代国际活动安排中的一些潜规则,例如大国官员作主旨发言,发言在前且时间

---

《选读》提出:“老子认为将世界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这样的理解恐不正确,老子只是强调得天下不可欲取而为之,“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当可得天下。参见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第19页。



长”，这似乎便是一种简单的比附。实际上，臧宣叔明确提到：“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其依据是合乎传统礼法的家族式的长幼秩序，这同无政府状态中，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因实力大小而形成的“潜规则”并无相关之处。

在认识论层面，先秦重“思想”而当代重“理论”。构建科学的理论，是国际关系学者从不讳言的任务。当然，什么是“理论”，这个问题学界并未达成共识。例如，对于行为主义学者来说，“传统主义”学说可能根本无法称作理论，至少不是科学的理论。沃尔兹（Kenneth N. Waltz）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对“理论”进行的经典分析，或许是国际关系研究者们所最常引用的。不过他的研究受到科学哲学的深厚影响，对于“理论”的界定未免显得严苛。通过查阅各种语言词典可以发现，不论理论，theory, th rie或teoria，虽然都有多种含义，但通常都包含这样两个要素：它描述的是特定领域的原则；它是对事实系统化的概括与抽象。这样的“理论”概念，虽然没有华尔兹的定义那样“科学化”，但显然也产生于西方近代科学的传统中——“科学”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分科的学问”，抽象也是科学认识中的必经环节。

先秦时期（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代）的思想家显然不会具有这样的观念，也不会构建这样的“理论”。他们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并不是孤立的，甚至也不仅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原则，而往往与自然万物的道理相通。如管仲说：“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管子·霸言》）；墨子认为，“有天下者……以农息事上帝山川鬼神”，而发动战争则“上不中天之利……中不中鬼之利……下不中人之利”（《墨子·非攻下》）；荀子说：“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荀子·王制》）；孔子说：“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大德者必受命”（《中庸》），等等。同时，他们也不会以抽象的概念为经、定

---

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第100页。

参见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2—3页。

例如，“理论是对法则的解释”这一论断，即来自于科学哲学家纳戈尔（Emest Nagel）。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 5.

如参见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ume 11, p. 278; Paul Robert, *Dictionnaire alphab tique et analogique de la langue fran aise: les mots et les associations d'id es*, Volume 6 (Paris: Soci t d du Nouveau Littr  1964), p. 282; Giacomo Devoto, *Vocabolario Illustrato della Lingua Italiana*, Volume 2 (Milano: Selezione dal Reader's Digest, 1967), p. 1311.

“科学”一词的拉丁语词源即是“分割、区分”，汉语中该词来源于日文，本意也是“分科之学”。

理为纬,通过推演的方式编织现代意义上的理论,而是以比喻、举例、叙事等直观的方法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如老子以“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说明“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道德经·六十一章》);韩非子以守株待兔的故事,说明不能“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韩非子·五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而《左传》、《国语》和《战国策》等,本身就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话语的记录。

如果我们将国际关系研究比作勘查地理,那么阅读“思想”即是登山鸟瞰,阅读“理论”则如查阅地图。地图的特点在于客观、简化、精确,并且可以分类查索,如矿业有矿业之图、交通有交通之图;山景的特点在于直观、真实,它无法分科分类,而只能提供全景,同时,我们的所见也随着观察点的变化而有所差异——“横看成岭侧成峰”,正如每个思想家给我们提供了各自的角度和景致,此外,山景能带来审美的乐趣,地图则难以做到,我们在研读当代理论时恐怕也难以体察到经典思想所具有的美感。

当代理论若能从古代思想中有所获益,“同”是基础,若无“同”,两者便无法通约;“异”是根本,若无“异”,两者便只能互相证明和重复。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古今思想之“异”也许比“同”更为重要。当然,先秦思想中不乏关于国家间政治的具体词句,与今人的想法有所不同,但如果没有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思维观念的整体理解,单论这些零散的文字就可能有所偏颇。以笔者拙见,恐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这两个根本性差异,更能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产生深刻的启示。

在本体论上,无政府状态当然是国际社会的现状,但同时,它也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结果。几乎所有的现代理论都承认这一状态的存在,并默认这一状态的合法性和永恒性,反过来,我们的这一认知又指引着我们的行为,使我们不知不觉地强化着这一现实。无政府状态不仅如温特

---

这并不是说,这些著作是客观的汇编,孔子的“春秋笔法”即体现了记录的主观性。与此相似,《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是以历史事件的形式反映主观思想的经典著作。

如参见 Beate Jahn, “Class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ntext,” in Beate Jahn, ed., *Classical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6.

所言,“是国家所造成的”;而且也可以说是理论家所造成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或许可以借用阿什利(Richard Ashley)对新现实主义的评断:“这种理论将已存秩序视为自然秩序……从而剥夺了政治交往中那些使社会学习和创造性变化成为可能的实际能力。”那么,我们如何来思考无政府状态的“创造性变化”,即这种状态的终结或是某种改变?

无疑,所谓“主权的终结”或是“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样的话语已经日益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主题。无政府状态假说与西方近代思维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后者“不想修改‘丛林’事实的内在逻辑(即私欲至上的逻辑),而只想修改这种逻辑的表现方式,只想把那种无规则的野蛮争夺方式修改为有规则的‘市场’争夺方式,而又默许只要一旦有条件超越规则就可以恢复无规则的争夺”。与此相异的先秦思想当然可以被用来克服这种思维传统。限于本文篇幅和个人能力,笔者无法在这里做出完备的论述,只是想提出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一,先秦思想如何弥补历史背景上的差异?如前所述,先秦时期的国家间关系中浸透着血缘或家族式的认同,当时的思想家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通常是等级制的)礼法或秩序的主张。在当今国际关系中,这样的认同显然并不存在,先秦思想怎样启发我们超越无政府状态?是要构建新的类似的认同,或是通过其他途径?其二,先秦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有何不同?在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初期,那些或许被错误地统称为“理想主义者”的思想家,就已经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克服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这样的理论尝试在冷战后进一步得到了复兴,如有些学者主张在国家体系的框架内实现“没有政府的治理”,有些学者则认为“世界国家是必然的”。先秦思想如何在同一主题上,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不同的思考角度?其三,先秦思想与其他文明的经典思想有

---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5.

理查德·K·阿什利:《新现实主义的贫困》,载于罗伯特·O·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35页。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22页。赵汀阳在这里是对西方政治哲学做出的评价,这一论断似乎过于武断,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也不乏与此不同的观念,如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等。

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刘小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Alexander Wendt, "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9, No 4, 2003, pp. 491—542.

何不同?从古希腊的第欧根尼以及斯多噶哲学家以降,西方就存在着“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或“世界公民”的思想传统,如但丁便有《论世界政府》(*De Monarchia*)一书传世。甚至常为国际关系学者引用的霍布斯,按其在《利维坦》中的逻辑推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之间也应当会产生一个世界政府,或世界性的利维坦。而在伊斯兰传统中,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的思想也启发了当代学者对新的世界秩序的思考。先秦思想与其他文明中的这些思想相比,能为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无政府状态提供何种不同的资源?

在认识论层面的差异则相对较易处理。《选读》的作者意识到了这种差异,并提出:“这给今天的学者们提供了两个启示。一是今天的学者难以对许多国际政治问题的本质再有新发现了……。二是今天的学者要推进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需要建立系统性强的思想体系。”而笔者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先秦思想的这种“非科学”或“非理论”性,或许恰能给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带来新的思考。众所周知,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界,由于20世纪中期科学哲学的影响,理论学说常常具有浓厚的科学化倾向,特别是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已成为显学。这虽然能使研究工作更加精细和准确,但也容易陷于枝节而缺乏洞察、偏于机械而缺少关怀,让学术在精巧的技术和模型中异化,忽视“人”这一国际关系研究的最终指向。我们没有必要刻意模仿注重历史比较和政治哲学的英国学派。如果在承认现代理论方法有效性的同时,能结合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传统,使自己的研究更具有思想性、深度和美感,那么我们同样能以中国的方式使国际关系研究更为厚实,避免“专家没有灵魂”的无奈。

### 三、结 语

在《先秦国际法之遗迹》一书的封面,作者引用了一句罗马古谚:“古代是前者”。作为轴心时代的智慧遗存,先秦思想永远值得我们回转目光,从中获得新的感悟,获得对新时代的启示。

前文曾列举了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待古希腊思想的三种方式:借古立今、

---

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第3页。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5页。

抑古扬今和以古促今。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在对待先秦思想的时候,最重要的应是踏实和谨慎,也就是尽可能完整、全面地了解经典作品及其时代背景,而不应见到与现代理论的相似之处就急于比附,见到不同之处就急于创新。若然“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则自然能以合适的方式对待经典,也自然能将经典思想融会于国际关系研究之中。

在阅读徐传保、洪钧培等民国学者的著作时,笔者不免揣测,他们之所以努力论证先秦时期存在着国际法,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贫弱,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说明它有资格立于现代国家之林。而今日的中国,已日益崛起,作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可以以更为平和、大度的心态对待先秦经典,为推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

王元化:《记熊十力小集》,载于王元化:《人物小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58页。